

芙蓉江文艺

2010.1

- 王 刚 正安小说创作评述
何育薇 牵牛花仙求医记
刘书青 我是农民
王力东 带你去看海
雷 霖 美泉先生三周年祭
林传军 诗歌小辑

贵州省正安县文联主办

二〇一〇年三月

芙蓉江文艺

2010.1

总第26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韦圣福 宋霖 李广勤 曾润素

主任 吴桂兰

副主任 戴洪 李易超

编 戴洪 李易超 王龙 熊志勇
李云翔 杨欧 陈智武 王晓龙
霖 田强 陈立航 文晓莉

名誉主编 罗遵义

主编 李易超

副主编 王龙

责任编辑 雷霖

通讯地址 贵州省正安县文联

联系电话 (0852)6426856

电子邮箱 zaxwl6856@sina.com

刊名书法 韩继忠

正安县文联主办

卷首语

好像只一转眼，花园里的“状元笔”又开花了。

“中国小说之乡”落户正安，欣喜有之，焦虑有之，忧患有之，思索也有之。王刚先生热情地写了《正安小说创作评述》，省市评论家也为“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研讨会”创作了十多篇评论文章，我们摘录一部分。

本期《芙蓉江文艺》，再次推出一位正安女作者，何育薇。何育薇刚从大学毕业，学的并不是文学，现在也还没有找到工作。在校期间，她创作了不少小说。看得出来，何育薇的文字有些早熟，思虑也好像有些早熟，并无太多学生文字的青涩和晃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想到何育薇却把这个家当得这么好，这么让人放心，让人看到希望。当然，她还不能把这个家经营得八面玲珑四处逢源。我们欣喜的是她有着这方面的潜质，并且一直在努力。

刘书青也是一位在校大学生，农民的儿子，始终不忘自己是农民。但其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已经和老家的农民有了很大不同。眉宇间自有一股吞吐之气，文字出入古今，纵横虚实，让人读来一笑，又让人笑后发呆。

王美泉先生停笔三年了。珍州文学沙龙聚会，无一次不谈起先生，无一次不唏嘘感叹，感觉先生就在我们旁边坐着，

能嗅到他身上熏眼睛的烟味，能听到他“我都还在写，你们怎么不写”的喝斥。先生身上的文学精神，可能正是当下我们在苦苦挽留的宝贝。雷霆的《美泉先生三周年祭》，实乃忧患之作。

我们还编了林传军的诗歌小辑，其诗真诚，热情，有着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但诗写方式技巧上，尚有一些不足，比如不够含蓄，少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感觉。其心热，其墨浓，技法上淡点儿，也同样感动人。

正安五中“桑林文学社”，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走进五中时，看到满满当当一教室的社员，看到一双双好奇而真诚的眼睛。孩子们可能还不太清楚什么是文学，这有什么关系呢？校门外的路那么宽，校园内好老师那么多，仰头看看天，那么高远。当明天到来，可能我们得请他们来给我们讲解什么是文学。于是，我们特给五中“桑林文学社”做一个小辑。不为别的，只为那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和那一支支晃动着童真与希望的笔。

李朝虎先生的长篇小说《真情》，本期正式连载完毕。感谢老先生的真情文字。

在新的一年里，《芙蓉江文艺》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春光般的支持和家人式的关注，恭祝各位虎年顺意，身心健康。

毕竟，《芙蓉江文艺》明天的命运，只能是读者阁下今天的表情。

芙蓉江文艺

目 录

特 稿

王 刚·正安小说创作评述·2

“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研讨会”论文摘录·9

小说之乡三人行

何育薇·牵牛花仙求医记(中篇)·27

刘书青·我是农民(中篇)·41

王力东·带你去看海(短篇)·55

芙蓉江散文

雷 霖·美泉先生三周年祭·60

余 灵·难忘《高考1977》(外一篇)·64

王少龙·晏溪印象·67

陈义伊·因为是女子·68

珍州诗页

林传军·诗歌小辑·69

校园文学

正安五中·“桑林文学社”小辑·77

长篇连载

李朝虎·真情·85

芙蓉江文艺

2010.1

总第26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韦圣福 宋霖 李广勤 曾润素

主任 吴桂兰

副主任 戴洪 李易超

编委 戴洪 李易超 王龙 熊志勇
李云翔 杨欧 陈智武 王晓龙
雷霖 吕强 陈立航 文晓莉

名誉主编 罗遵义

主编 李易超

副主编 王龙

责任编辑 雷霖

通讯地址 贵州省正安县文联

联系电话 (0852)6426856

电子邮箱 zaxwl6856@sina.com

刊名书法 韩继忠

正安县文联主办

正安小说创作评述

王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安小说创作以文志强、赵进争为代表；七、八十年代形成以石定、赵剑平、王美泉、陈智武、陈义忠等人组成的作家群；新世纪组建的“珍州文学沙龙”聚集了大批文学爱好者，王华、罗遵义、杨欧、王龙、雷霖、王小龙、陈南水、杨韬等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正是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打造出响当当的“小说之乡”的文化名片。

一、文志强与赵进争：正安小说创作发轫

1950年代，是正安小说创作的发轫期。这时，文志强先后供职于《新黔文艺》、《山花》编辑部，站在较高的平台指导正安的文学创作。对于正安小说创作来说，文志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创作上的身体力行，写下了《一位苗族老人》、《生活的第一课》、《血泪仇》、《炉火红心》等正安建国以来的第一批小说，更重要的是，他对家乡文学人才的爱护和培养。新时期崭露头角的正安籍作家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他认真地对待每一篇来稿，他为正安作者回复的信件，“总是用红格竖笺毛笔书写，精致得就是一件艺术品。”（罗遵义《正安：中国小说之乡》）

赵进争在1950年代的小说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浪漫风格。时代精神燃烧的激情，社会转型期的离奇事件，作者在芙蓉江畔的难忘岁月，风华正茂时代的美好憧憬，构成他小说的浪漫情调。无论是收集了1950年代的小说集《难忘的爱情》，还是出版于1992年代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情》和2005年的长篇纪实文学《难忘的岁月》，其中都有一个形象高大的男主人公。虽然有众多女性的爱慕如众星捧月，但他以高尚的情操真诚地面

对每一份珍贵的感情,在得到家人和爱人的理解下作出自己的感情选择。除了在感情上的左右逢源之外,主人公能够以其敏捷的才思,宽阔的胸怀,果敢的态度,处理好工作上的难题,化解各种矛盾。赵进争的这种叙述,是对新时代理想人格的期待,是营建新社会和谐道德观念的努力,也是意气风发的作者对理想抱负的抒怀。他的小说大多发生在芙蓉江边,与1935年或1949年前后的政治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运用了“人物再现法”(即同一人物在多篇小说中出现),故事曲折生动,人物富于个性,叙述充满感情,基本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

1950年代,是共和国掀起建设高潮的年代,是集体主义精神高扬的年代,人民群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建设激情,廖川溶的《养蚕人》、《放蚕人的故事》表现出新农村的新风尚。养蚕能手蔡三姑在养蚕的关键时刻,离开还在吃奶的儿子,彻夜不眠地守在蚕房;金老汉的蚕生了病,正在一筹莫展,邻队的小伙子们赶来解救了危机。廖川溶的无矛盾叙述正是群众高涨的建设热情的真实写照,也是纯真年代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真情描述。

文志强、赵进争、廖川溶的创作反映出正安乡土文学的基本走向。文志强的苗寨题材小说、红军题材小说,廖川溶的养蚕小说,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赵进争以正安的母亲河——芙蓉江为故事的发生地,表现芙蓉江流域的风土人情,描写芙蓉江两岸民众的生活和斗争,对正安的小说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文志强、赵进争、廖川溶以及青树华等人陆续发表小说作品,为正的文学青年树立了榜样,鼓动起他们文学创作的热情。以石邦定、王美泉等人为代表的中学生经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还互相传看习作,往往争吵得面红耳赤。”(罗遵义《正安:中国小说之乡》)而石邦定、王美泉等人,在1980年代成为正安小说创作的骨干力量。

二、石定与赵剑平:奠定正安乡土小说的基础

经过1950年代至1970年代漫长岁月的蕴藉,正安小说创作在新时期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石定和赵剑平是这一时期正安在全国产

生影响的代表作家。正是他们以及这一时期正安作家的创作,为创建“小说之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石定有过被政治放逐的经历,这是作为户籍的下放而实施的。政治放逐对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他在放逐中成熟,成熟得坚毅而深刻;另一方面,他真正认识了黔北民众——在与喧嚣尘世的比较之中,他感受到纯朴善良的山民身上人情味的温馨,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他们观察、反映黔北乡土的认同角度和思想倾向。因此,在石定的小说中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和黔北乡土味。那是未受现代文明感染的静谧乡村,是古朴而久远的现实,是真实而自然的存在,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向往的家园。尽管也写生活的沉重,也写日子的艰辛,但是,那柔美的自然形态总给阴郁的生活抹上一层温馨的色彩,给人以慰藉和希冀。在那些礼赞传统人性、昭示生活希望的作品中,这种对自然的诗意描写更是烘托出柔美轻快的氛围,使作品具有散文诗的气质和品性。石定作品的文人气息较浓,在艺术上规范化程度较高,对生活的艺术处理比较深入。因此显得端庄秀丽、雅致澄澈,富于诗情画意,有灵气、有风韵。同时,注意语言的魅力,让人们在语言的修辞、词语选择,语言的排列组合、句式安排中欣赏到美,表现出作家们诗化生活的自觉意念。

石定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取舍中作出艰难的选择,在预示现代文明的美好前景之时也礼赞传统人性的美德。他以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人物形象显示他对黔北山民的深刻把握,又以独特的心灵表达方式刻画了纯朴善良的黔北农民。《公路从门前过》表现王老汉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到的强有力冲击。古朴淳厚的传统生活模式、物质文化并重的现代生活模式引起老人的心绪骚动。他终于在心灵的剧痛中微笑着向过去告别,在观念中演习着现代化的幻梦。《天凉好个秋》表现了交织着新与旧、真与假、丑与美、前进与停滞的有过于强烈的辩证意味的黔北农村现实,真正感受和传达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意蕴。系列小说《小城故事》将背景导向凄风苦雨的旧时代,在黔北城镇人物的动人故事中融入富于黔北味的乡风民俗,寄予他对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短篇小说《大水》、系列小说《山乡纪事》、《乡村笔记》有文化寻根的意味。他不对农村现实作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而是再现农民的生存环境,挖掘他们的深层心态,从而映现促使他们行动的文化基因。《大水》写老人与“大水”的堂吉诃德式的奋战,作品显现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是在这过程的中体现一种持之以恒、契而不舍的精神。

以中篇小说《天凉好个秋》为界,石定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前期以《重阳》、《青山遮不住》、《牧歌》、《公路从门前过》为代表,体现出澄澈雅致、细腻平和、自然流畅的柔美风格。后期的主要作品有《小城故事》、《乡村纪事》、《山乡笔记》等。这些作品多用白描手法,注重情节结构,有简洁干练、言简意赅的特点,于柔美之中透露出阳刚风骨。如写意画,留下许多空白让人咀嚼。《重阳》等作品如精心制作的工笔画,《小城故事》等小说若大写意的水墨丹青,而贯穿两个阶段的灵魂,是溢满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何士光与石定都注重氛围和情绪的渲染。在这种渲染中,何士光偏重于理性思想的深入,石定侧重于诗意环境的再现。

赵剑平是正安创作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远树孤烟》、《小镇无街灯》、《赵剑平小说选》、《困豹》记录了他探索的足迹。

1985年,赵剑平的六部中篇先后在《收获》等大型期刊发表,并结集为《远树孤烟》出版。这些作品以集团进军的态势,展示了他的生活底蕴和艺术功力。这一时期,赵剑平将传统分为正负两极,将优良传统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让负面传统在时代的曙光中全军覆没,表现出对农村改革和农民心态转换的乐观态度。《红月亮,白月亮》中对榨坊原始生命力的描写,对顺风爷传统人格的诗意阐释;《远树孤烟》叙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殊死搏斗;《青色的石板街》中的枫香坚韧的生活意志、柔中有刚的性格,强调了传统人格的刚烈和坚韧。

《小镇无街灯》体现作家对传统惰性和智慧思考。在“巨人小说”(《巨人》、《冲嫂和半截男人们》)中,赵剑平运用了变形、夸张、象征的手法,塑造令人警醒的、卓然不群的艺术形象,以“超人”的视角审视愚顿的山民,用矫枉过正的方式刺激“不幸”而又“不争”的芸芸众

生,表现出改造愚昧的凌厉浮躁之气。系列小说“夜郎故事”回避了传统与现代的敏感话题,从人性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探讨,形成厚重的文化氛围,突出有着地域文化烙印的人们的生存追求。“动物小说”(《獭祭》、《第一匹骡子》)以动物讽喻人类。写活了骡子、“女毛”的情欲和“人性”,写得刚毅壮烈。相比之下,真正应当具备人性的人类就显得冷漠残忍。“巨人小说”中抨击沉寂现状的偏激态度,“夜郎故事”中对黔北山民生存状态的审视,“动物小说”中对残酷人性的针贬,显示出作者已经抛弃创作初期对传统与现实简单态度,已沉入到黔北的历史文化之中,去体察“老中国儿女们”的深层心态,以获得对农村社会现实的更加真实而清醒的认识。

《赵剑平小说选》仍然对传统进行的反思和剖析。但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远树孤烟》中的热情和乐观,也不是《小镇无街灯》中的激越和愤慨,而是激情喷射后的冷静和沉思。《白果》突出传统巨大的向心力。神智不清的老牛毛却死活不离开房前那棵象征家族历史的白果树,尽管白果树留给他的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最后,白果树被炸翻,磨盘岗经历了兴奋后趋于沉寂,德彪村长仍然一成不变地履行他的带有宗法制色彩的职责。传统的界限难以逾越,传统的巨大向心力又是多么复杂多么令人费解。《破车》描写了一场闹剧式的悲剧。槐子将一辆退役的“破车”开回闭塞的官村,它很快成为官村人生活的组成部分。破车给了官村人方便,开了官村人的眼界,也给官村人带来了荣誉。但是,破车,尤其是开破车的槐子,在被嫉妒心支配着的官村人的心目中终究是异类。遭到无端羞辱的槐子怀着无从倾诉的愤懑,将破车开下山崖后离家出走。官村的“看客”们屏息敛气地观看完全狗导演的这场闹剧后,带着心灵的满足开始重复往昔的时日。《穷人》是一部对农民命运进行深刻反思的力作,赵剑平将他对农村落后根源的思考凝聚在“穷人”唐二这一典型形象之上。他深受“越穷越光荣”的误导,成了真正的“穷人”。他因为懒,不愿出去抢人,因此穷得“根正苗红”。唐二的典型形象折射出畸形时代荒谬的价值观,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解放以来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反思。

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困境,探索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想途径,表达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坚定信念。表现出作者宽广的视角和世界眼光。小说“从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变革中的农村的,他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民族的局限,甚至文化的局限。他笔下的农村不仅仅是贵州的农村,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农村,而且是地球上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存场所。”(宋强.绝望的困境.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

赵剑平不对人物及环境进行精雕细刻,也不用拖泥带水的拉杂叙述,更不作缠绵悱恻的诗意描写。他喜欢沿着既定的单纯的故事主线,铺设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细节,大刀阔斧地推进情节,在达到高潮时嘎然而止。他对黔北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原滋原味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描写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渲染出浓郁的地域氛围,具有民俗学的价值,也体现出作品的厚重和实在。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刚烈倔强的人物性格,雄奇豪放的环境描写,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烘托出赵剑平小说的阳刚风格。

石定小说的柔美,赵剑平小说的壮美,支撑起正安小说创作的两极,给正安作家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石定的田园小说、改革小说、小城故事、乡村笔记、乡村记事,赵剑平的峡谷小说、巨人小说、夜郎故事、动物小说、穷人小说,扎根于黔北厚重的土地,状写黔北山民形象,奠定的正安乡土小说的深厚基础,对正安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1980-1990年代:正安小说创作的实绩

在1980、1990年代,在石定、赵剑平的影响下,在王美泉、罗遵义等人的组织下,正安形成了本土的作家群,有着浓郁的小说创作氛围,成为名符其实的“小说之乡”。他们坚守着脚下那一片厚重的土地,从多层面、多角度描写多姿多彩的乡土,刻划绚丽多姿的世俗人生。在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既有田园情调又有封建残余的乡野元素:青山绿水中孕育的两小无猜;少男少女们出嫁的演习;迷人的情歌对唱;清泉水中少女们的沐浴;夕阳下的炊烟;小溪旁的花草;浓郁的乡风民俗;山民们

狡黠的智慧;“晃晃客”新思潮的传播;姑娘们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封建家长的淫威;野蛮的族法族规;守旧而愚昧的乡民;鲜活生命遭到无端地践踏;新旧势力搏斗产生的悲喜剧……。在文明与愚昧、进步与停滞、创新与守旧的乡村两极社会中,正安作家找到了创作灵感与源泉。也由于对厚重乡土的情感和依恋,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去寻找山外的世界,而作家们自己却固守着乡土,没有去眺望山外世界的精彩。王美泉、陈智武、陈义忠、罗遵义、刘祖建、初立信以及军旅作家刘世杰,是这一时期正安作家群的代表。

王美泉与陈智武的小说有相近的风格。他们生活在有着浓郁风情的农村社会和市民社会,熟谙有几分狡黠带几分乡村智慧的“地方性知识”,对农村和市井广为流传的幽默故事、哲理故事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就是一篇有深厚意蕴浓烈情意的小说。他们的创作得益于乡村生活、市井生活的蕴藉丰厚,得益于他们对乡村生活和市井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形象阐释。王美泉擅长讲“大山里的小故事”。他铺陈其事,直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然而并不将故事的意蕴抖落出来,总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由此以微不足道的“小故事”映现内涵丰富的“大山”,于琐碎的生活中体现山民的生存状态。系列小说《大山里的小故事》写的就是10个引人思考的生活片断。系列小说《营盘寨人物》、《好吃老常》,在叙事上更显明快、简洁、跳跃。省略了许多交待,凸现故事的主干,意蕴上少了几分质朴,多了一些荒诞和喜剧色彩。陈智武的《巫公》、《野食》描写农村男女偷情的问题,事情的荒谬、当事者的豁达和作者笔调的轻松似乎可以让我们一笑了之,但掩卷思之好象又笑不起来。《乡野风情》(三则)写的是生活片段,虽然琐碎但富于生活情味,表现出作者运用乡土语言的功力。《矮子》写以德报怨的故事,充满男女主人公相濡以沫的真情。老初的小说集《那一片绿叶》表现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描写艰难岁月中人们的真挚情感,情节单纯,笔调清新。

陈义忠、罗遵义、刘祖建善于刻画乡村女性形象,这些秀美山川养育的女子个个如花似

玉、重情重义。在闭塞落后的乡村、流言盛行的小镇，在男性贪婪的目光中，她们象美丽的花朵盛开而凋谢，她们用美丽和真情，演绎着人生艰难曲折的过程，诉说着一个个美丽女性辛酸的故事。陈义忠的小说集《隐情》是一部充满浓郁的地域风情的小说集。这里有秀丽的山川，柔美的少女，温馨的农家小屋，静谧的市井人家。在这里，时代的大潮冲溅起朵朵浪花，激荡起层层浊流，碰撞起人性善与恶的闪光，演出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其中，《碎玉》、《小镇风流》、《赌品》、《天意》是耐人品味的篇章。小说集《罗遵义小说选》构建了一个黔北的典型场景——地域风味浓郁的九曲镇。罗遵义将视点聚焦在小镇女性身上，通过她们的曲折经历，演绎极富小镇风情的悲喜人生。小容（《小镇风月》）、玉凤（《玉凤》）、润菊（《秋凉》）、桃花（《桃花》），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有着曲折的命运，都有着带有浓厚地域色彩和传奇色彩的故事。小小的九曲镇，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事关国计民生的壮烈之举。但是，这些平凡人用生命演绎的悲欢离合同样精彩，同样让我们梦绕魂牵。供职于广东汕头市的刘祖建描写的仍然是家乡正安，在他的中篇小说集《悠悠恋歌》中充满了家乡乡野的元素。他着重表现的是野蛮习俗对人性的戕害和对青春生命的扼杀，将小说的时态定格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封闭乡村。因为一个梦，贵生将亲生儿子活活埋葬（《情债与权梦》）；因为“八字”不合，竹容不能与心上人相爱，被迫嫁给李驼背，从而投河自尽（《苦涩恋歌》）；竹儿生下的儿子经“观花婆”“鉴定”是仙胎，从此竹儿失去的爱的权利（《野恋》）；因为“私奔”，三个少女被赤身裸体捆在树上“示众”（《风景的诞生》）。刘祖建一方面突出无辜少女的纯洁美丽真情，一方面渲染封建势力的野蛮残酷无情，表现美丽生命惨遭惜屠戮的悲剧，在善恶两极描写中展示小说的张力。

有着25年戎马经历的刘世杰创作了不少以军旅为题材的小说。中篇小说《岁月的子弹》再现牛牧与兰雨林的不同命运：脚踏实地的牛牧凭自己的努力事业有成，投机取巧的兰雨林虽然风光一时，最终却威风扫地。小说运用了偶然、巧合、照应、对比等技法：牛牧与兰雨林性格与命运的对比；牛牧转业到兰雨林妻

子、也是深恋着牛牧的葛楠工作的单位；牛牧的女儿与兰雨林的儿子成为恋人。《躁夏》与《铁马秋风》描写在经济浪潮冲击下部队生活的躁动，以及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的真实生活。小说以一名部队机关干事的视角进行描写，有着复杂而独特的感受。小说有着较强的自叙传色彩：作者也有过小说主人公牛牧、赵可明（《躁夏》）、邹贤国（《铁马秋风》）的相似经历。

四、新世纪的新气象

进入新世纪，经过几代正安作家的努力，正安小说创作队伍已经蔚为大观。《青春》主编弥尔台将正安文学现象誉为“新时期正安文学现象”；省文联领导认为正安是“贵州文学的重镇”；正安与遵义市作协举办“尹珍文学奖”（小说奖），并设立每年10万元的“芙蓉江小说创作基金”；“中国作家西部历史文化创作基地”落户正安；2007年，省文化厅命名正安为“小说之乡”；2008年，国家文化部颁布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中，正安“小说之乡”榜上有名。除了在全国具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王华之外，“频频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小说作品的有中老年作家王美泉、陈智武、罗遵义，青年作家杨欧、雷霖、王龙、王小龙、雷波、秦丰、郑周雄、骆礼俊、许雨松、李易超、刘兴宇、陈南水、帅巾、冯其沛、雷贤圣、陈立航、王兴宇、王开宇、王力东、陈鸿、王少龙、冉火子、王学、刘斌，以及少年作家杨韬、冯垚等等，其阵容及强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罗遵义：《正安：中国小说之乡》）

进入新世纪，正安作家创作视野更为开阔，表现领域有所拓展。王华以现代创作观念在乡土题材、民族题材方面深入挖掘，再现底蕴深厚的黔北乡村世界；雷霖、王农与冯其沛强调乡村精神，铺垫小说浓厚的文化底色；杨欧、王小龙注重叙述技巧与语汇的色彩运用，加大语言的张力；秦岭、张仁琼通过生活片断，折射出官场世态的炎凉；雷贤圣侧重江湖世态，注重情节的曲折和夸张，郑绍兴描写历史人物，借古喻今，许雨松写青春生命的凋谢，充满青春的激情；雷波写商场的尔虞我诈，再现人性的诡诈多端；陈南水表现民间智慧和狡黠，在一本正经中见出荒谬，在貌似平常中看到畸形社会心态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李易

超、刘礼贵、骆礼俊、秦丰描写时代大潮冲击下五光十色的世态人生，从中解析人性的善恶是非；郑周雄、宋小松、张亚林表现乡间生活的波澜，在细微之外见出人情的冷暖；还是在读大学生的杨韬已经创作了不少的小说，获得了“文学新人奖”，他以当代都市生活与校园生活为背景展开故事，在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后发优势强劲。

王华是正安青年作家的代表，也是当今文坛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2005年，王华的《桥溪庄》在《当代》发表，获得《当代》长篇小说拉力赛冠军。短篇小说《一只叫聋耳的狗》、《逃走的萝卜》被《小说选刊》转载。她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雒赐》，出版了长篇小说《家园》、中短篇小说集《天上没有云朵》。她以优异的创作实绩，接连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贵州文艺奖”、“乌江文学奖”、“尹珍文学奖”、“遵义文艺奖”等奖项。

王华的小说表现出对乡村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她说：“需要一些作家能够冷静下来，专门去关注那种差不多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大时代的阳光温暖。”（贵州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倾听女人心》，2008.11.24播出）在长篇小说《桥溪庄》中，王华以环境污染为背景，关注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桥溪庄无雨无雪，男人死精，女人不怀胎而怀气；雪豆刚生下来的就发出“完了”的预言，让桥溪庄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颠狂的雪果将母亲视为妻子的幻影进行强暴，被父亲踩下脚板；精神恍惚的雪豆终于清醒过来，却怀上了同样疯颠的雪山的孩子。作者用夸张、变形等手法，描写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脱胎换骨的蜕变和阵痛，荒诞的表层描写中蕴含着真实的本质。其主题意象、语境营建、表意方式等方面，受到现代小说的影响，表现出在艺术上的创新。《桥溪庄》的意义在于，“作家超越了乡村立场或城市立场，站在人类立场的高度，以人类特有的铺天盖地的悲悯情怀，关照桥溪庄人的生存，成为当代作家零距离反映生活底层，描写边缘人当下状态的发轫之作。”（周静《固守在故土和乡情里》，贵州日报·2009年1月16日）

在正安县斑竹乡采访时，王华了解到该村还没有用上电灯，村上还有几百个光棍的情

况。她几次深入村庄采访，写出了长篇小说《雒赐》。一个女人侍两、三夫，既是雒赐庄流传下来的奇婚俗，也是当地村民在极度贫困中的无奈之举。漂亮的外乡女秋秋嫁到了雒赐，开始了与雾冬、岩影和“我”三兄弟的情感纠葛，也开始了与雒赐这块土地的情感纠葛。当真相大白于秋秋后，“我”与秋秋为争取“一夫一妻”的婚姻进行了苦命挣扎。因为“我”是一个懂得尊重女人的有知识的人。在雒赐庄，只有“我”对她说过“对不起”。但是，当“我”攒足了钱，准备从岩影、雾冬手里赎出秋秋时，秋秋却拒绝了“我”——她与断了腰的雾冬有了孩子，全家的生活全靠岩影维持。拼命反抗挣扎的秋秋却选择了安于现状，决定和雾冬、岩影一起度过余生。小说演绎了一个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荒诞故事，一段悲泣在“白太阳”之下的尴尬人生。王华向我们展示了乡村底层人民生存的恶劣环境和他们艰苦挣扎的历程，用她特有的角度和方式，唤醒人们的良知，表达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终极关怀。小说“白太阳”的意象具有象征意义：“雒赐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里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有真正的阳光。平时，这里最富有的就是雾，于是，很多时候雒赐的天空就会有一轮白太阳。从升起到落下，一直洁白如银，一直那么美丽而忧伤。”（《当代》，2005年第1期第110页）象奶一样稠的浓雾给人以透不气的压抑，丧失了本性的太阳才会洁白如银。自然界的变形与人类社会的变态有了象征性的对应。

杨欧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强调叙述的功能，在细节的叙述中，在琐碎事件的描述中一层层地剥开故事的内核，水到渠成地表达要倾诉的情感和意念，自然而然地完成故事的叙述。他刻划出小多（《半个月亮爬上来》）、冯三木（《麻雀飞来飞去》）、“女孩”（《水晶葡萄》）等市井人物艰难的生存状态，表达他深切的人文关怀。琐碎的叙述、零乱的人生图像、芜杂的生活环境，构成小说沉重的氛围，让我们关注那一群似乎微不足道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底层百姓。中篇小说《青蛙跳舞》写商界弄潮儿贤庆的兴衰。还是漫不经心的叙述，看了半天似乎还没有进入正题；儿时的琐事，任何一位小镇青少年都曾经经历过的争风吃醋、打架斗殴，都在贤庆身上发生了。作者又顺理成章

地描述了一位商界的贤庆，似乎少年时代的顽皮就是贤庆发家的资本。最后贤庆死了，死于一群青年人的刀下。好像没有明晰的线索，都是一些轻描淡写的叙述，甚至没有能摆上桌面的故事。但仔细品味起来，可以体会到小说旋律的跳动。贤庆为“我”斗殴最后死于斗殴；贤庆剥过青蛙，“我”在贤庆死后，脑海里出现的是青蛙的意象：“那绿色的精灵一样的舞者，看似矫健，却一下一下地丧失了蹦达的力量。”这就为贤庆的死下了注脚：似乎是偶然的斗殴所致，实际上是他恶习的积重难返，正如在冷水锅里逐渐加热的青蛙，“一下一下地丧失了蹦达的力量”。

土生土长的雷霖对地域生活状态烂熟于心，运用富于地域文化的语言得心应手，描写地域文化心态驾轻就熟。他写山民崇高的追求，也写生存的欲念、本能的渴望。构建他小说框架的不是错综复杂的情节，而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微不足道又深沉厚重的本能欲望。儿子的一句玩笑话勾起“老人”抱孙子的希望，传宗接代的使命感驱动着“老人”，“老人”有了生存的动力和理由，在喂猪攒钱抱孙子的“伟业”中乐此不疲，以致熬尽生命的最后一滴油。（《猪槽里的月亮》）中篇小说《花开时节》的素娥是一个本份的、有着能挣钱的男人和体面家庭的少妇，唯一的缺陷是男人的不举。性的渴望和无性的现实折磨着可怜的素娥，本份的素娥只有将对性的渴求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妇女们露骨的性的体验的撩拨下黯然神伤，在丈夫无力的举措中吞咽着苦果。《云端的月亮》刻划了“向校长”的典型形象。破烂冷清而充满生机的乡村学校，简陋而庄严的升旗场景，山谷里此起彼伏的驱赶恐惧的哨音，爱生如子和打骂学生，为父母洗脚的家庭作业，敬惜字纸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教师也是“校长”还是超度亡灵的“先生”的特殊身份，让我们对那位默默无闻、朴实无华、事业重于泰山的“向校长”肃然起敬。三篇小说中，“老人”对延续生命的希望，素娥“性”心理的涌动，向校长对山村教育的献身，似乎是不相关联的追求。不管这些不相关的欲念在社会背景下价值几何，但是，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它们价值连城，那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内容。《猪槽里的月亮》对养猪过程的津津乐道，《花开时节》对

素娥潜意识的描写和地域风情的描写，显示出作者的叙事能力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

王农的《神鹰》是乡村灾难的预言。经历过干旱、鼠患、野猪肆虐、豺狼逞凶、耕牛失踪等一系列离奇事件之后，崖头坪已经不适于人居了。村民们相约逃荒避难，只剩下步履蹒跚的牛福老爹和两只无所事事的狗游荡在空寂冷清的崖头坪。不能让村子就此衰败，是老爹的坚定信念，他坚守崖头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守”体现了牛福老爹的精神力量。在《赤足走过田野里》中，庆明和庆槐“坚守”的是破旧的村小。摇摇欲坠的村小是退下来的村长庆槐的一块心病，他只有拖着病怏怏的身子到村小去修修补补以偿还心债。坚守了几十年的庆明老师为村小四处奔走，为乡领导信口开河的800元钱望眼欲穿。“坚守”，是两篇小说主人公的主要动作，也是作品深入开掘的精神实质，同时体现了乡村生存状态的严酷，体现了作者对坚守乡土的人们的礼赞。小说厚实的生活底蕴，人与自然之间力量悬殊的较量，底层人民的坚守与官员轻薄许诺的比照，使小说有着沉甸甸的份量。《鸟叫》也写“坚守”，写公务员大水好奇的“坚守”——对办公室对面阳台浇花的漂亮女性的执意观察。由此写出一个贪官与情妇的故事，一连串偶然又必然的发现。小说注重结构的内在联系和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的发现，少了一些沉甸甸的份量。

正安小说创作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已经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形成良好的创作体制和创作机制，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拥有自己的“小说之乡”的文化品牌。相信正安的小说创作会越来越兴盛，“小说之乡”品牌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远。

注：由于本人阅读视野有限，一些作品没有纳入写作范围，请见谅。

（王刚：遵义师院副院长、教授，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中国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研讨会”论文摘录

杜国景

《“区域文学”与正安作家群》

解读正安作家群的小说,需要联系“区域”和“地域”意识来分析。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文学的思考空间。即不囿于偏狭的自然地理与地方文化传达室承,不是一种立足于方言、风物的乡土悲悯或对于乡土的乐志畅神,更不是一种由风土人情出发的民俗自恋。尽管这也是正安小说的某种风格或某种重要的质地。但如果以这种地域文化的眼光去解读正安作家群的小说,那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正安作家群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地域文化意识的,可以从“区域”一直通向“国家”意志,通向现代性核心价值诉求的现实关怀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安作家群的小说所描写的生存方式,所揭示的生存危机,从来不是单纯意义的地域情怀或生态关怀。关山阻隔,风俗荒蛮,人性闭锁等等带有地域文化属性的人本哲学、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思考,从来不是正安小说艺术追求的最后归宿。不错,正安小说对生命、历史、文化的睿智思考,总是在一种现实困境中来展开的,但这种展开主要与国家

对区域、地方的动员改造相联系，而不是归结为自然环境或民族传承。在正安作家群的小说里，自然环境与民族传承都只是一种言说语境、物质性外壳，生存困境中的诸多现实掣肘、制衡，这才是小说的精神内涵。这个特点，或许可以叫“借地域言说区域”，或“借地域圆区域的梦”。

从赵进争、文志强那一代开始，正安小说的这个传统就已见端倪了：区域意识大于地域意识，政治文化压倒地域文化，这是那一代正安作家的选择。同时这也是五六十年代的一种流行时尚。对地域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是在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由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人的性格、情感和行为统统被认为是由阶级地位和政治意识所决定的，因此那时的小说往往忽略人的文化内涵，而仅仅关注区域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建构。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定势开始受到质疑，回归地域，文化寻根，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选择，尤其是地域文化传统中的集体无意识，一时间成为发现人、描写人的一个很时尚的切入点。正安作家群中的第二代，如石定、赵剑平等，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崭露头角的。这一代正安作家准确地把握了地域被区域挤压，传统被现代冲击的时代信息，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延续了正安小说的现实关怀传统。在《公路从门前过》、《水妖》、《青色的石板街》、《远树孤烟》等小说中，乡村虽然还遥远、贫穷、落后、愚昧、远没有走出“地域”的樊篱，但蛰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灵已变得不安分，不封闭。他们的情感和人格现在已经具有了象征民族国家气运的精神复兴的内涵。“区域”的躁动与变革，是这时正安小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

到八十年代后期，赵剑平的“巨人小说”、“夜郎故事”和“动物小说”才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了传统与现代碰撞，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地域文学的叙事模式，放弃了对“乡愁”美学的追求，而试图在寓言、象征的意义上，去把握区域文化变迁中的人性内涵。这无疑是个进步。如何光渝所说，赵剑平的这些小说“显示出作者已抛弃创

作初期对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肤浅理解，在黔北的历史文化中，对农村社会现实、‘老中国的儿女们’的心态，有了更真实、更清醒的体察和认

识。”赵剑平是一个有着创新意识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困豹》超越地域意识，追求普世价值的倾向更为强烈。比如，在传统地域文学或“乡愁”美学视野里，本应该成为道德楷模的令狐荣，在现代“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却成了一个“腐儒”——他千辛万苦寻找的女学生，成了发达区域的社会意识和经济条件的俘虏，不愿意再跟他回乡，而他对其中的玄机却浑然不觉。看来灵魂需要得到启蒙、拯救的，似乎不是女学生，而是她们的老师。令狐荣的精神困境，固然来自“地域”的封锁，但小说对三个被拐卖的女学生的最后选择，就没有多少地域批判的锋芒了。这是一种体现着现代性思考的人文素质，或者可理解为地域与区域的和解。此外，小说中那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豹子，跟《狼图腾》或《藏獒》“狼”或“獒”也不一样。这头困豹不是小说的主角，而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或寓言意义的道具。真正的主角是在错欢喜的土地上苦苦坚守的人。而将他们的生存带入困境的，是“区域”经济社会的种种弊端。豹和人两条交替展开的叙事线索的重合，也可看作地域与区域的和解。

对自闭于地域的警惕。正安作家群的“正安经验”尤其值得重视。在区域文学的视野里，正安作家群的小说甚至可以用“辉煌”来形容。他们以边缘的姿态去感应时代的脉搏，去呼吸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策源地或中心地区、发达地区的种种新鲜空气。这是一种强烈的区域感或区域意识，被它所催生的这种表达欲，这种创作冲动。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给了我们诸多启示。正安作家群必须要具备区域视野，又必须立足于地域文化与个体记忆。对地处边缘的正安作家来说，后者的重要性尤其不言而喻。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思考、抉择，如何既依托地域文化，又超越自己的前辈对同一个地域文化认知水平，以谋求与时代主潮沟通、对话的可能，直到脱颖而出，为中心区域所认同，这其中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与美学内涵。说得极端一点，思想观念、艺术方法、知识体系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在不断的重复中形成或获得，而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地域文化记忆则是无法替代和重复的。因此，每一个区域、每一代作家的形成，都是地域经验向主流叙事的一次成功转化，其中必然意味着

美学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是区域文化与地域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区域意识甚至更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边缘”向“中心”，地域向区域的转化过程中，我以为最应该注意的，是对自闭于地域的写作倾向，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地域文学传统太强大，“边缘”写作受它的影响太深，在目前的“边缘”写作中，地域意识不是太弱，而是太醒目、太刺眼，甚至堕落为一种卖弄了。“乡愁”或者荒蛮、愚昧，苦难或者对生命的体恤，在蹇先艾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不乏卓有成效的开掘了，假如不在这种传统的地域美学的发现中去寻找足以感动这个时代的新因素、新动向，那我们就不能从地域走向区域，走向世界，不可能进入到现代性核心价值的“中心”地带，纵深地带。而这种新因素、新动向，必然来自现代社会的区域意识。

蓝卡佳

《从方言的语用特征看当代正安小说语言的地域特色》

贵州正安，以其整齐的创作队伍和丰硕的创作成果而形成了本土的作家群，有着浓郁的地域小说创作氛围，成为名符其实的“小说之乡”。“小说之乡”的作品以其方言的语用特征表现出作品语言的地域特征，这也是“小说之乡”的作品的地域特色之一。

当代的正安小说，作家们都是在自觉地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进行创作，但是，典型的地域环境和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又使得作家们在运用共同语进行创作的同时，下意识地运用本地的方言语用特征。正安小说的作者们大多都是本土作家，言语行为中都自觉地运用方言的语用特征。正是这种言语形式那浓郁的地方特色，提升了作品的表现力。

同义词语和同形词语的选用体现作品的地域性正安作家们在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进

行创作时，言语行为中在对同义词语和同形词语的选用上，体现出作品的地域性特征。正安作家们在运用共同语进行创作时，也时而在同义词语的选用上带上了方言的语用特征，有时还运用了普通话与方言词语的同形词，语形相同而意义有差异，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同时也更加凸显地域特征。

词语的语法构词形式和同义句式的选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习惯。所选用的词语的语法形式和句式的选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习惯。

言语行为中常用某些具有地域特色的谚语、民谣、顺口溜。

修辞手段常用具有地域特点的表达方式。虽然正安作家们在创作中已经自觉地在运用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在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叙写一地之人事，要表现一地的生活，必得展示出此地的独有色彩。方言话语的语用特征，既能传达信息，也能体现一地人事的特征。作品的言语表达，在本地人和异乡人的眼里，这种话语形式能显示出地方风韵，传达出乡土的情趣，而独特的乡土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追求的。正安小说作家们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正是他们所热爱的这片土地的风情。尽管这里的生活贫困，精神贫乏，但他们还是以他们充满激情的言语行为，我手写我口，寂寞地去写，呕心沥血地去写，以方言的语用特征，凸显其文学语言独特的地域特色。

潘辛毅

《在天上种玉米——试论正安小说的好看与耐看》

正安的几十位老少作家无疑都是讲故事的行家里手。尹珍故里的今昔变化、人情冷暖、乡俗俚曲、官场风波、民间纠葛……都展露在正安作家笔下故事的起承转合之中了。在正安作家的小说世界里，都有真实的纪录、生动的表现，最难能可贵的是，正安作家在对故乡的“寻常人”、“琐屑事”的深入关照和精细表

现之中，显现出了一种真切的理解之心、伟大的悲悯之情，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的灵魂的提升、情感的净化作用，正是从这里得以展现。

于是，我们就听到了木莲溪边满公低着嗓音唱起的放鸭人的山歌，尝到了何牛儿带给玉秀的刺莓、桐果、刺梨、松子、猕猴桃等山野实的甜蜜与芳香；我们就晓得了从江津搬到正安的王二爷的“老胡开文”牌的墨锭远近行销，枫香大姨娘家的烟坊的桐油灯碗就四季不干；我们会为黑溪村人与牛角村人在“天上没有云朵”的时节因抢水而开仗而叹息不已；我们会思索为什么昔日的黔北乡间凡是日子过得殷实一点的，都有细儿娶个大媳妇的习尚；我们知道了黔北乡间青年男女新婚后天回门时新女婿在丈母娘的特殊待遇背后的别样意味。

虽然多黔北方言，还引用了民谚。但念起来很顺，与普通话的距离也不大。遵义人读起来很亲切，外地人读起来会产生一种新鲜感。而遵义过去的历史经济状况，地理情况，社会的演变，百姓的生活，还有故事发展的因由等等，都隐然在其中了。

雷霖《花开时节》中的一段：

自从媒人第一次将吴雄带来在丈母娘跟前一戳，吴雄这娃儿的模样就印章似的烙在了老人心上。自家素娥吧，不说多，又勤快，脸皮又薄，实在是心疼。

遵义有句民谚：“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吴雄这个小伙，外表周正、强健，丈母娘当然印象好。然而，吴雄在夫妻生活中的名不副实，正是造成素娥人生悲剧的直接原因。这是素娥母亲完全料想不到的。所以，她对素娥的“实在是心疼”就真是透露出母亲的特有的敏感了。

正安的小说家们大都在一种人性的悲悯情怀的关照下，讲述了好听的乡土故事；并且在对待故乡的“寻常人”、“琐屑事”的深入体察和精细表现之中，融入了鲜明、浓郁的乡俗民情、乡土文化；能自觉地用别样的、俗白、生动的方言俚语来强化小说的表现力和艺术弹性，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正安作家们执着讲述的正安故事、黔北故事，只要讲出了人性高度和思想深度，讲出了地域文化的别样意味，讲出了艺术个性的别样精彩，正安作家群体中就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福

克纳和今天的沈从文。我们期待着，希望越来越多的正安作家把“玉米”种到“天上”去！

刘丽

《青春的期盼与感伤—— 读杨韬的作品》

杨韬只是一个从黔北山乡走出来的孩子，一个想在文本中表达却又不十分清楚要表达什么而又执着地表达着的孩子。对此他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情心和责任感是最起码的条件，而在此基础上，“为人民服务”才是最根本的目的。也就是说，对待写作，杨韬充满着认真严肃的态度，他希望在作品中，能反映生活或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就是对社会关心的回报。

杨韬的这种创作思想，与他所接受的黔北文学、尤其是正安文学的影响有着血肉联系。将现实人生作为观察描写的对象，无不是以黔北民生状态为表现内容，表达了作者想为老百姓说点话的情怀。文学传统的影响，使年轻的杨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有意识的发掘生活的土壤。于“人民”，要有悲悯的情怀和起码的道德良心。发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用开放的眼光和广阔视野去审视、探索生活，让创作根植于土地，同时又不为土地所囿。这是黔北作家或者就是正安作家给后起者的启示。杨韬就是在这种启示下，以一个年轻写作者的身份大声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写不出来就不要写！不要把写作作为卖弄的玩意儿或骗钱的工具，亦或发泄的器皿。

这种思想具体到作品，就是《二狗子轶事》、《我的病》、《透明墙》等作品反映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我的病》故事情节简单，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贪欲膨胀，揭示出社会腐败只有用法制才能治愈。作品表达明白，语言直露，表现出一个初写作者激愤心理的宣泄，使作品少了蕴涵。《二狗子轶事》中的二狗子，是一个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农民，勤劳肯干，“二狗在外面专心找钱，婆娘在家专心干

活,不缺吃,不缺穿,还存上千多元钱呢!”应该说,这在农村算得上小康人家了,但作者目的不是歌颂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生活,而是要揭示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给人们带来的历史重负:重男轻女的观念在遭遇计划生育后所产生的反应,农民要儿子,想方设法要儿子,于是找相关关节人物——计生股长送礼,终于获得了儿子。但故事并没有完结,计生股长因受贿被抓,二狗也因此被罚款、结扎。故事本可就此完结,但作者又给小说加了一个尾声,二狗结扎得了后遗症,拖着一大帮小孩,日子越过越艰难,最后又将所生的一群儿女送人了,自己疯了失踪了,老婆也跟别人走了。对二狗的失踪,人们反应是这人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一篇千多字的小说,将农民因袭的观念,社会的腐败和腐败受到惩治,人情的冷暖和人性的冷漠等都容纳了进去,如此大的容量,不能不说作者潜涵着巨大的讲故事的能力。但我们也看到,直言不讳的表达,叙述的累积,使作品没有定性,似乎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而带来主题的多重反而损害了主题的表达。这让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作者,急于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张扬着对身处的客观世界发言的欲望,因而使作品缺少了张力。

《透明墙》采用“我家的故事”和“房客的故事”的复调结构,将个人体验融入到家族兴衰的历史感伤中,两个故事都归结到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上,虽然有时叙述跃出框架之外,但文字清晰,对语言的感觉和对真实世界的敏感与揭示,使情节不枝不蔓,人物形象饱满。经济强势形成的精神优越的母亲;懦弱守成而跟不上形势、最后终于有钱了而挺直了腰干的父亲;随便大胆而又有经济头脑的郎银花;胆小而又执着、生活在自我世界中的四阿婆,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比起前述的两篇作品,无疑是一大的进步。而字里行间透露出无奈的感伤气息,对于一个初入文坛的写作者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

《青春乱》与《沧海蝴蝶》一样,在青梅竹马的书写中,张扬着情感的欲望。讲述的都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青春故事,一如《透明墙》的格调,充满淡淡的哀愁与无奈,更像是一出温情脉脉的、带有唯美风格的“韩剧”,剧中充满青春的迷惘、忧伤和疼痛。一方面,他们

肆意放纵情感,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真挚感情,而这真挚感情又在不经意中悄悄从指缝流过,于是,在独自品味孤独与无奈中增添了虚空的疼痛。这种痛,虽然充满了幼稚,且带有浓浓的都市情结和“小资情调”,但其中所表现出的青春期内心挣扎,不能不说是80后、90后作家的共同特色。

杨韬笔下的爱情总发生在幼时的同伴中,有时还有青石板相伴,更像是古龙笔下的儿女柔情,古老的让人向往,真挚得让人心痛,流露出浓郁的哀伤情调。我想,这不应该是杨韬这个少年对爱情的体验和感受。这种孤独的哀伤,更多地表现出了一个农村孩子在走入城市后,对城市的向往一方面使他很快地融入了“现代生活”,而存留于心底的农村的“家”的温馨又使他对城市陌生,并由此带来的隔膜。否则何以在他的作品中,对幼时情感的追溯,对儿时同伴的依恋,成为一种悠远而绵长的感伤?小说就在这温柔迷离而又真切动人的叙述中,把无奈的伤痛、落寞的孤独演绎得一唱三叹,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韵味。

南 鸥

《生命的图景, 灵魂的演绎

——简评世杰先生文集《岁月的子弹》

世杰《岁月的子弹》提供给读者的空间也是多维的,正是这样的多维性和不确定性,才让作品获得一种艺术的张力,拥有更加辽阔的思想和审美的空间。

应该说命运对世杰先生非常的慷慨,应该说世杰先生远比许多他同时代的人幸运。

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渐渐从聚光灯下躲到安静的角落,成为人们生活的小情小调和随意的装饰。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杰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文学,成为文学忠实的仆人。在世俗和浮躁的现实中,世杰先生的这一份追求显得如此的难能可贵,令人肃然